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戴元光◎主编

Houxiandai

Yujing Xia de Chuanmei Yanjiu

后现代语境下的 传媒研究

宋瑜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014034218

传播学百科文库·传播思想史论系列

主编:戴元光

G206

82

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

宋瑜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航

C1722548

G206
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语境下的传媒研究:戴维·莫利传播思想研究/宋瑜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00-9318-3

I. ①后… II. ①宋… III. ①传播学—思想评论—英国
IV. ①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8405 号

策 划 人 郭银星

丛书责任编辑 于淑敏

本书责任编辑 于淑敏

责任印制 倪 亮

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5 千字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0-9318-3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丛书总序

《传播学百科文库》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设计的、反映当代传播学理论研究前沿成果的高水平的理论研究丛书，作者主要是近年来活跃在传播学研究前沿的青年学人，也有年长的学者，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新秀。入选丛书的专著主要标准是“新”；或是话题虽老，但观点“新”；或是话题新，观点也新；或是新人新作，或是研究空白点。

收入丛书的 15 本著作，主要为两个系列：传播思想史论系列主要是对国内外一些重要问题的最新研究专著，不乏新论，其中西方学人研究是对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的系统研究。这些学者都是各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又对传播学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传播学前沿理论系列主要研究视野是当前的关注点，主要是对中国相关学科的研究。

传播学科可能是整个人文社会学科中最年轻的学科，西方的研究不过百年，中国的研究近 40 年，但传播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却是任何学科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包括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媒介对人的影响，媒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已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媒介对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社会的解构与建构，媒介对人的价值的解构与建构，也已经是现实，尽管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一个人的学术生命（研究生命）约 35 年，而我们之所以用三四年的时间来完成这样一套丛书，和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有关。

传播学从西洋传来近 40 年，把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引入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态，指示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路径。但我们又不无遗憾地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也有很大差距，与国际水平也有很大差距。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播学研究整体上比西方落后，整体上处于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阶段。我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地位相当落后，以宣传代替新闻传播，公信力低；传媒政策及媒介经营理念滞后；媒介结构单一，制度供应不足；资源整合能力低，融资途径不足；非理性的娱乐化倾向膨胀；传媒呈现贵族化精英化趋势；面临国际国内多重冲击与压力，面对因社会发展、互联网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集体意识消解、社会信任危机、公共观念淡薄等新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新文化价值建构。

本丛书尊重学术研究规律，坚持学术自由的宗旨，力采争鸣与探索、批评与反批评的向度，因为探索、争鸣、批评是走向真理的桥梁。

在丛书出版时，我写了以上的文字，爰充为序，以求教于方家。

戴元光

2011 年初秋于上海

序

宋瑜的书稿是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博士论文开题到论文完成，她大约用了三年多时间，从论文到书稿完成又花了约两年时间。我对她的研究题目感兴趣，但我对她能否完成有疑问，特别是研究一位当代的学者。现在看来，她完成了。宋瑜对一位学界有争议的西方当代学者的初步研究，我由衷高兴，使我感到她是位很认真的学生，也是位刻苦的学生。就本书来说虽也有些许缺陷，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文化研究急剧变化的年代，尤其是美国，这个研究大背景是必须先明白的，而本书却在这方面有点不足。但总体上看，这本书是不错的。

关于戴维·莫利，正如作者所说，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众多学者中，他可能并非最出色的一位，但无论是他的理论视角还是研究路径，学界对他的批判焦点与关注程度，处处体现着典型的伯明翰学派传统与特质。莫利长期以媒介为中心，在他人忽视的一隅执著地探讨着媒介不同层面的作用——从早期的“人种志”电视受众研究，到后来在家庭收视情境中分析性别与权力关系，再到对全球化媒介形成的后现代地理下的民族/文化认同的探讨，直到近年来转向家庭媒介技术的人类学研究，莫利始终坚持跨学科的理论路径，强调从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等多学科视角来审视传播和文化，多次纯熟运用人种志方法对包括电视在内的媒介的家庭消费进行了物质与符号意义的探讨；在全球化媒介构建的后现代语境下，他尝试从政治经济学、新的传播技术对媒介受众潜在的文化影响等方面展开分

析,探讨有关文化认同、新技术和文化跨国传播等问题。他的媒介理论为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莫利出生在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二战退伍老兵,战时曾在航空母舰上当飞行员。1954年,莫利的家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电视机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年,对于战后英国家庭来说,拥有一台电视机,不仅仅能享受科技带来的新鲜与便利,更是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象征。电视机成为出现在莫利童年生活中的最具实验性和变革色彩的现代科技手段,极大地丰富和影响了他的成长岁月。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是理查德·霍加特于1964年建立的,主要用于培养研究生。虽然是独立运作,但隶属于英语系,规模非常小。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4年霍加特正式辞职的10年间,中心的全职教师始终只有霍尔和霍加特两个人;到1980年霍尔离开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多达40人,但中心正式的教师始终只有3人。为了应对师资力量不足的缺憾,当时中心的两位导师——霍尔和麦克·格林(Michael Green)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导师制度和学生互助自主管理体制。他们让所有学生根据兴趣参加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女性研究等学习小组,以小组讨论和集体合作的形式开展学术活动,两人轮流去参加各小组的研讨活动和报告会,促进大家交流学术思想、探讨学术问题,再适当给予一定的指导。中心的学生包括正式注册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还有像莫利这种学籍关系在外校,但在CCCS进行课题研究的研究生。当时的学生很多后来成为活跃于文化与传媒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包括戴维·莫利。莫利1972年底正式加入CCCS的媒介研究小组,师从霍尔进行博士课题研究。上世纪70年代正是伯明翰学派挑战传统受众研究模式,建立起“积极的受众”研究新范式,从而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影响力的辉煌时期。莫利为文化研究视角受众观的理论建构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本人更是凭借1975~1979年间对英国广播公司的晚间电视新闻栏目《全国新闻》进行的经验性受

众研究一举确立学术地位，堪为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功臣。

在伯明翰，莫利从最初聚焦于严肃媒体对于政治和权力的新闻报道，然后把关注的焦点转向较低层级、更通俗、少严肃性的《全国新闻》电视文本上，开始关注不同群体对于《全国新闻》节目的解读，那时的研究主要还是比较人为想象的电视消费环境；为了修正“人为”收视环境的假设，莫利逐渐把研究焦点转向电视在家庭里的消费情况。接下来为了弥补“家庭电视”中研究的不足与缺憾，莫利计划扩展研究视角，不再仅仅孤立地对电视加以研究，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去中心化”的媒介消费框架里，将电视作为录像机、电脑、电话、随身听、音响等家庭媒介集中的一员来探讨各种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家庭使用。

离开 CCCS 之后，莫利进入莱彻斯特理工学院（Lanchester Polytechnic）传播学系担任讲师。80 年代曾先后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芝加哥西北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等地的高校担任客座教授或访问学者的工作。1982 年他还为英国有线电视第四频道（Channel 4）的开播担任策划。

90 年代以后，莫利加入伦敦大学歌德史密斯学院，主要从事大众传播和媒介/文化研究的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莫利创建了跨国研究小组和太平洋亚洲文化研究论坛，主编出版了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的“跨媒介系列丛书”，同时在《文化研究》、《欧洲文化研究》、《电视与新媒体》、《亚洲文化研究》等多本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刊物担任编辑或顾问，还参与了英国第一家互动媒体出版机构的经营。

我们知道，90 年代后，文化地理学、后殖民理论、全球化与后现代理论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中备受青睐。莫利积极吸纳这些理论，同时更为关注收视行为所处的情境以及媒介和传播技术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莫利进一步认识到，电视作为一种传播媒介，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从而把在其他方面各

不相干的群体聚集到电视这一共同体验上，并把此处与彼处的文化混合。在与凯文·罗宾斯合著的《认同的空间》（1996）中，莫利走出了人种志研究模式的限制，试图把他的受众研究向全球范围延展，结合后现代地理学来探究大众传播生产和消费与民族/文化认同的相互作用。面对现代传播媒介接合私人与公共的空间，跨越家庭和国家的边界所创造的崭新电子文化空间，莫利在《家庭领地》（2000）中分析了全球传播中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全球性与地方性的“接合”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问题，着重探讨了全球传媒现代传播与故乡情结、民族文化、地域观念、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彰显了电子媒介在构筑“压缩时空”后现代环境复杂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受众是由设想它的范式所促成的建构物。因此，研究范式不同，受众的角色定位便有所不同，而且研究受众所采用的方法也会不同。早期传媒研究的主流是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出发进行的传媒效果研究，将电视观众看作被动的消费者，深受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充满消费主义的欲望。这样的看法流行了一段时间，被发现有很多缺陷，因为许多研究表明，观众实际上坐在电视机前主动地进行了多方面的参与。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莫利的新型受众理论范式则是构建于一个在很多方面与上述主流研究范式不同的理论观念之上，虽然带有英国文化研究鲜明的人文科学色彩，与以往研究中很多重要“断点”紧密相连，但在不同的理论构架上发展了主流研究已经发现但未能深入下去的工作。

我读了宋瑜的书稿，记下了以上的文字，作为序。

戴元光于杭州翡翠城居所

2014年1月2日

目 录

丛书总序	戴元光	1
序	戴元光	3
绪 论		1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11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22
第一章 戴维·莫利的生平与传播思想发展		29
第一节 童年的媒介经历与传媒研究旨趣的启蒙		29
一、童年的电视体验与媒介消费研究的缘起		30
二、海外的文化读物与身份认同研究的启蒙		32
第二节 曲折的求学之路与宿命般的伯明翰经历		33
一、一波三折的求学之路		34
二、宿命般的伯明翰经历		36
第三节 伯明翰辉煌时期的传媒受众研究成果		37
一、文化研究视角的受众研究：对《银幕》理论的批判		38
二、《每日电视：〈全国新闻〉》：对文本威力的质疑		41
三、“家庭电视”研究：生活情境中的电视消费研究		43
第四节 人类学视角的介入与学术轨迹的转折		46
第五节 后现代地理学影响下的媒介研究新视角		50

第六节 英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危机与发展思考	52
一、转变狭隘的正统性心态,学习别国的学术传统	53
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积极回应科技的革新	54
第二章 戴维·莫利传播思想的理论溯源	56
第一节 西方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56
一、美国经验主义传媒效果研究	57
二、英国文化研究的诠释性立场	61
三、政治经济角度的传媒批判	64
四、交锋中推进的传媒研究新视角	67
第二节 伯明翰学派传媒研究的学术传统与理论成果	73
一、伯明翰学派传媒研究的学术传统	74
二、伯明翰学派传媒研究代表人物的理论成果	80
三、伯明翰学派对传媒研究领域的贡献	93
第三章 新型受众理论与家庭收视行为研究	97
第一节 研究溯源与新范式的提出	98
第二节 新型受众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	100
一、前提:“封闭”结构的文本与“积极”解读的受众	101
二、立场:“交叉话语”空间中的“矛盾召唤”	104
三、核心:文本重构与阶级/意义系统之间的关系	106
第三节 新型受众研究范式的发展与转变	109
一、体裁模型:突破“编码/解码”模式研究文本/ 受众关系	109
二、家庭电视消费的人种志:家庭收视语境中的性别/ 权力关系	113
三、双重焦点:家庭电视消费研究的新视角	115
四、修辞研究:新语境下重构受众与媒介关系	120
第四节 理论批判与价值重估	123
一、历史视角下的理论批判	124

二、研究方法论的价值重估	134
第四章 后现代地理下的政治传播思想	145
第一节 全球化媒介建构下的后现代地理	147
一、媒介新秩序与民族认同危机	147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后现代地理	150
第二节 后现代地理下的传播权力与新的文化认同	153
一、超越决定论逻辑的后现代地理学研究	154
二、全球化媒介对“西方主义”认同的建构	157
三、媒介新体系下社会群体政治文化的衰败	161
四、后现代环境中传播权力的跨文化运作效力	165
第三节 后现代地理学视角下的“现代性”探索	171
一、“去西方化”视角下的现代性的地理研究	172
二、超越全球化模式发展现代性的区域理论	177
三、后现代语境下释解城市对现代性的演绎	181
第五章 人类学视角下的媒介技术研究	195
第一节 历史视角下探讨家庭媒介消费的发展趋势	196
一、延续对“家”的探讨：被“媒介化”的家与“移动” 的家庭体验	197
二、媒介“家居化”进程：传统价值框架下的新技术融入	200
三、媒介“个人化”趋向：重新定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	202
第二节 在人类学视野解读家庭媒介消费的象征维度	208
一、家庭媒介消费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208
二、媒介技术在家庭中的社会性与象征性	211
三、家庭媒介的性别化消费与文化属性	215
第三节 新媒介技术生态下的媒介理论发展	221
一、重估威廉斯技术观：对“技术决定论”的再批判	221
二、技术“乌托邦”批判：对技术合理性悖论的反思	224
三、超越二元论思维：传统、现代性与新的媒介技术	229

第六章 戴维·莫利传播思想对中国传媒与文化研究的启发 ...	233
第一节 传媒研究本土化：对理论跨语境移植的思考	234
一、“去西方化”视角下发展“扎根理论”	235
二、因地制宜：文化研究理论的中国本土化	239
第二节 媒介研究方法论的启发借鉴	248
一、跨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	249
二、研究方法的实用主义选择	263
第三节 对中国传媒研究的现实影响与意义	266
一、为传媒文化“正名”：通俗文化就是政治	267
二、质疑收视率：实证性受众研究的前景	270
三、对全球化背景下应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启示	275
四、新媒介生态下媒介素养教育大众化的意义	280
结 语	286
参考文献	293
一、英文资料	293
二、中文资料	298
索 引	304
后 记	312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尽管英国文化研究的起点被公认为是 1964 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简称 CCCS) 在英国伯明翰大学 (Birmingham University) 的成立, 但如果考虑到其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 (Richard Hoggart) 的《文化的用途》(*Uses of Literary*, 1958) 和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 均出版于 1958 年的话, 那么文化研究的发端似乎应追溯到二战结束; 同样, 尽管伯明翰大学的 CCCS 是在 2002 年 6 月才被迫关闭, 而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始, 随着一批有影响力的伯明翰学者纷纷离开 CCCS 各谋发展, “文化研究”的涵义就已超越了 CCCS, 超越了伯明翰。70 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内部扩散; 80 年代文化研究扩散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学术取向; 90 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以来, 文化研究在亚洲, 包括中国再度升温。如果我们将“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密切关注当代文化现实同时又具有超越性的学术取向而非“占山为王”式的学术流派, 那么它在这半个世纪的变迁中显然保持了自己的活力。单凭这份强韧的学术生命力及其所反映出的理论的开放包容性, 英国文化研究及其主要学者的思想绝对值得中国学界详细了解、系统研究、深入探讨, 进而因地制宜地进行跨语境借鉴, 以为研究中国传媒与文化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参考。

正是在这样的考量下，本书将研究的焦点对准了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戴维·莫利。

1. 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严格说来，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的利维斯（F. R. Leavis）或者更早的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两位英国文化批评先驱从精英主义立场对大众文化的探索。在 1869 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中，阿诺德提出文化应为最优秀思想的遗产，他认同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认同高雅文化，猛烈抨击大众文化。利维斯的文化批评思想也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对高雅文学经典的崇尚，1930 年利维斯发表《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一文，认为文化只为少数精英分子所拥有，精英文化应该成为判断的标准。正是上述两位学者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为后来人的质疑和超越奠定了基础。CCCS 开张之初，目标之一即是改写阿诺德和利维斯的精英主义文化定义，也正是因为超越并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领地，文化研究才在英国得到长足发展，并迅速占据当代文化学术主导地位。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英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电视的逐渐普及，英国工人阶级接触到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尤其是美国的文化产品大量输入英国，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受到了很大影响；其次，随着二战后经济的发展和富裕工人的增加，英国在阶级问题上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工人阶级人数的减少和中产阶级人数的上升，阶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虽已模糊但仍存在；再次，比阶级问题更严重的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日益凸显——北爱尔兰与政府军的暴力冲突一再升级，大量鼓励移民政策所引发的种族骚乱不断出现，女权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高潮……复杂的社会局势困扰着英国政府，引发了学界的探讨与争鸣。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为代表的几位出身贫寒的“新左派”

知识分子从反“利维斯”精英主义的立场对教育体制改革、社会转型、阶级关系与文化变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逐渐形成一个知识流派，60年代《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创刊更为这一流派的崛起提供了文字战斗的阵地。霍加特的研究超越了利维斯早期所主张的用经典文学来启蒙大众的模式，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使之直接深入到当代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和福利等工人阶级所经历并直接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和批判性分析。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963）被公认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之作。

1964年，霍加特接受英国企鹅出版社的资助，在英国中部的伯明翰大学英文系创建 CCCS，霍加特本人担任第一任主任，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正式崛起，CCCS 宣称其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①。学派秉承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开创的研究路径和学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对以往被贬低的大众文化、工人阶级文化从理论上进行积极的评价和阐释，开始了创建自己独特理论体系的第一步。CCCS 依循霍加特最初所规定的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严肃地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功能以便对社会民主的权力集团进行批判；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兴趣转向也导致研究者对其旧有的范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文化研究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越来越朝着其审美的一面发展；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他文化形式，其中包括影视制作、文化工业、音乐、广播、爵士乐、服饰、发型等通俗文化艺术甚或消费文化。文化研究开始在英国的学术体制内得到初步的确立。

1969年，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接替霍加特成为 CCCS 第二任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伯明翰学派”以开放式的姿态吸收了不少新兴理论，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罗兰·巴特

① 张华：《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文化研究网站 www.CulStudies.com，2006。

(Roland Barthes) 的结构主义, 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的意识形态理论,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霸权理论和拉康 (Lacan) 的精神分析理论, 完成了文化研究“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整合, 在工人阶级文化与亚文化研究、大众文化与传媒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 其中包括霍尔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 1973)、《解构“大众”笔记》(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1979)、《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1981) 等著名论文, 深受霍尔影响的保尔·威利斯 (Paul Willis) 的《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r, 1977)、戴维·莫利的《每日电视: 〈全国新闻〉》(Everyday TV: “Nationwide”, 1978) 和《〈全国新闻〉的受众: 结构与解码》(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1980), 以及集体合作的《仪式抵抗: 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 Youth Subculture in Post - War Britain, 1976) 等, 霍尔凭借卓越的组织能力使文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在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伯明翰学派都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镇。

1969~1979年的十年是 CCCS 历史上最鼎盛最风光的时期。这段时期的丰硕成果也为该中心赢得了与“法兰克福学派”齐名的“伯明翰学派”的称号。70年代中期以后, 伯明翰学派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 许多学校开始讲授“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学位。70年代末, 霍尔离开 CCCS 前往英国开放大学从事成人教育工作, 他召集该校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及“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的成员编写“英国文化研究”的教材, 把文化研究发展成为一种可传授和可训练的教育手段, 使得“文化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英国学院体制内逐渐成熟起来。80年代开始, 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关注, 其影响也逐渐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